

# 八世纪新罗与西方的海上交流

王莉\* · 王杰\*

〈目 次〉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1. 新罗僧人在唐朝情况 | 3. 西方与新罗之交往 |
| 2. 西行的新罗僧人   | 4. 结论       |

八世纪以前,史料中尚未见到新罗与西方直接交往的记载。从唐朝开始,由于新罗僧人的大量来华并继续西行求法,从而揭开了以新罗僧人为主体、以佛教为媒介的新罗与西方海上交流的序幕。

## 1. 新罗僧人在唐朝情况

众所周知,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,它诞生于公元前5~6世纪的印度。汉晋之间,佛教由西域传入我国。“此后,多因我国僧人冒万苦入印,得佛教之真传,中土渐为传法之中心。”而朝鲜、日本则因在我国的东方,所以佛教亦是以中国为跳板,再传到朝鲜、日本去的,即其“故恒由中华传法焉”<sup>①</sup>

据载,我国南北朝时期,新罗僧觉德入梁求法,“是为入学之始”<sup>②</sup>。到了隋唐时期,新罗僧人大量来华,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两国之间文化与经济交流活动。根据入唐日本高僧圆仁在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的记载,当时在中国北方一些地区,特别是沿海港口都建有新罗馆、新罗坊、新罗院等,它们均是该国佛教僧侣的侨居地、学习地或中转站。而其中又以专门供新罗僧人举办宗教活动的登州赤山(今山东文登)建造的新罗法华院和青州(今山东益都)龙兴寺新罗院最为著名,赤山院系由新罗大海商张保皋出资建造,寺内共有新罗僧人30余名,“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”<sup>③</sup>,是新罗人在华的一个重要聚会场所和贸易中转站。

入唐新罗僧人有很多,其中不乏声名卓著者。专门收录中国宋代以前历朝名僧的《宋高僧传》就收录了8人,如:顺璟、义湘、元晓、玄光、无相、地藏、无漏、道育等,均因德性很高、著述颇多而“声振唐蕃”<sup>④</sup>。他们之中,少部分是循陆路入唐,而大多数人则是“泛东溟至于中国到京”<sup>⑤</sup>。尤为值得注意的是,其中更有一些新罗僧人在中国学习这后,效法唐僧,继续西行去天竺(古印度名)取经,名

\* 中国·大连海事大学

① 汤用彤《隋唐佛教史稿》

② 同上

③ [日]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

④ [宋]赞宁《宋高僧传》

⑤ 同上

留史册。

## 2. 西行的新罗僧人

宗教信仰有助于地理活动的开展。由于印度是佛教圣地,所以西行前往“希礼圣迹、学问求经”<sup>①</sup>已成为东方佛教徒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我国东晋的法显、唐初的玄奘、义净是西行求法的三大著名高僧。而唐时西行的新罗僧人也大有人在,据义净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记载主要有7人,即:阿离耶跋摩与慧业陆行至印度,学于那烂陀寺,玄太、玄恪陆行学于大觉寺。又有慧轮海路来华、陆路西行。还有二人从广州航海西行。“泛舶至室利佛逝国西婆鲁师国”,可惜中途病亡。此外,义净还提到高丽的僧人玄游海路而行。留居师子国(今斯里兰卡)。

在西行的新罗僧人中,最有影响的是慧超大师。据有关专家推测,慧超可能出生于唐武则天圣历三年(700),约于开元十一年(723)“即往天竺并被巡礼”<sup>②</sup>。其去时由广州出发,可能取海路。开元十五年(727)秋返回唐土,著有《往五天竺国传》,被认为是继玄奘、义净之后,研究八世纪上半叶中亚及印度各国历史的重要文献。

古代僧人们求法和布教的路线,其实就是商业贸易的路线。佛教从一开始似乎就和航海和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从古籍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到,僧人们泛海,多是附商舶,与商人结伴而行。当时,由新罗经中国西行的海路主要有二段:

第一段,新罗到中国,有二条航线:一是从鸭绿江口或汉江口等地出发经黄海到山东半岛;一是沿中国东海岸径自南下,经黄海、东海到浙江的定海或明州(宁波)<sup>③</sup>,慧轮来华走的就是这条航线。

第二段,由中国航海西行至印度半岛诸国。据义净记录,此航路为广州——室利佛逝国(sumatra 之东南端)——或至河陵洲(爪哇)——经麻六甲至耽摩梨底国(Tamralipti 在恒河口)、或至狮子国(锡兰)再转印度<sup>④</sup>。

然而,西行的旅途极为艰难,正如义净所说:“观夫自古神州之地,轻生殉法之宾……或西越紫塞而孤征,或南渡沧海以单逝”。“胜途多难……实由茫茫象碛,长川吐赫日之光;浩浩鲸波,巨壑起滔天之浪。独步铁门之外,巨万岭而投身。孤漂铜柱之前,跨千江而遗命。或亡餐几日,辍饮数晨……致使去者数盈半

① 汤用彤《隋唐佛教史稿》  
② 《唐》慧超《往五天竺国传》  
③ 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  
④ 汤用彤《隋唐佛教史稿》

百,留者仅有几人。”<sup>①</sup>可以说,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古代,除了出使的使节,也只有商人和僧人肯背井离乡,忍受辛苦,冒着生命危险,往来跋涉东西方之间。在公元7—8世纪涌现的东西方航海文化交流的浪潮中,新罗僧人也以其宗教虔诚和无畏,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。

### 3. 西方与新罗之交往

早在隋代,新罗僧人安含来华求学后,偕同天竺乌菟国僧毗磨罗真谛等二人、摩足罗国佛陀僧伽一人一道回归新罗。这是西域胡僧直接到新罗之始<sup>②</sup>。此后,随着毗邻欧洲的阿拉伯人出现在印度和南海一带,西方人对新罗的自然和经济等方面情况的认识也逐渐增强。

最早提到新罗情况的是唐代到过中国的阿拉伯大旅行家苏莱曼,在其撰成于851年的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(又名《苏莱曼游记》)中即曾提到:“中国东部临大海,有锡拉(sila)诸岛。岛上居民是白色的人,他们每年向中国朝廷纳贡。”

846年,阿拉伯的伊本·考尔达贝也在《道里邦国志》中准确指出:“中国尽头有众山及诸国,那就是新罗国(Al-Shila)。”

943年,又有阿拉伯人马苏第在《黄金草原》中提到:“在中国另一方的沿海,除新罗及其附属岛屿之外,原没有人说到过其他王国,也没有提到其他地区。”

由上可见,西方阿拉伯人对当时新罗国在“中国尽头”的地理位置是比较清楚的,而伊本考尔达贝在他的书里还进一步介绍道:“该国盛产黄金,由于那里土地良美,故有一些穆斯林入其国就定居下来。没有人知道新罗人以外的情况”。则其亦与朝鲜半岛北部孕藏丰富的金矿资源相吻合。西方阿拉伯对万里之外的新罗国,了解如此清楚,当得自直接参与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阿拉伯人、波斯人、印度人,以及东亚诸国人。在这当中,西方伊斯兰教徒的东来并定居新罗国,更显得殊为珍贵。

如前所述,早在846年成书的《道里邦国志》中已提到了“一些穆斯林入其国(指新罗国)就定居下来”。943年问世的《黄金草原》又具体提及:“从伊拉克或从其他国家前往新罗的外国人,到后不久就离开的人是极为罕见的,因为那里气候宜人,河水清澈,土地肥沃,物产丰富”。1154年,任职于意大利西西里王国的埃德里奇在《诸国风土记》一书中对新罗也大加赞美。说它“土地如此肥沃,其财物如此之富有,以致于前往旅行的外国人定居在那里,再也舍不得离去。”

<sup>①</sup> 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

<sup>②</sup> 《海东高僧传》

从中可见,公元8世纪前后,即中国唐朝时期(约相当于阿拉伯的倭马亚王朝时期),的确有“一些穆斯林”到达了新罗国,并定居在那里,值得注意的是,法国东方学家费琅(G·Ferrand)在其《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》中还介绍这样一个情况:叙利亚人马里克奇曾提到:有数名阿利得岛民,因反对当朝宫廷的迫害,曾在新罗避难。则定居在新罗的阿拉伯人籍贯,亦是相当清楚的。伴随着阿拉伯人的访问并定居新罗,伊斯兰教的传入新罗,亦必属无疑。

#### 4. 结论

综上所述,可以得出如下结论:

- 4.1 唐代有大量的新罗僧人来华访问、留学并侨居。
- 4.2 来华的新罗僧人中,以慧超为代表的部分僧人继续乘船西行,前赴中亚诸国求学取经。
- 4.3 在8世纪以新罗僧人为代表的新罗与西方海上交流过程中,同样有不少西方阿拉伯人前往东方,定居在新罗,并带来了西方伊斯兰教及其文化。